

往事如昨

我的红色“战斗”家族

王评

前段时间,读了父亲撰写的10多篇回忆文章,如同阅读一部赓续红色血脉、传承战斗精神的家族史。

我老家在文登侯家镇马家芥村,是远近闻名的兽医世家。烟台通伸的兽医门诊,由本家王敬轩(中共地下党员)经营,后成为交通情报站。我太爷爷王宝景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,却在十里八乡颇具威望。抗战时期,日伪军进村扫荡,把太爷爷捆到拴牲口的木桩上,严刑拷打百般折磨,抢去全部粮食及家当。死里逃生的太爷爷对敌人恨之入骨,买来土炮架在院墙上,准备与日伪土顽决一死战。恰在此时,八路军游击队联系太爷爷,请他筹办药品及救治伤员。

在初家午台的兽医铺,深夜有人来找太爷爷,大伯父就在外面锁上门站岗放哨。有陌生人靠近,便叩击门环,屋内人就从后门走了。临走时,太爷爷总把提前备好的药品让他们带上。大伯父问:“这些人是干什么的?为什么拿药却不收钱?”太爷爷正色道:“他们都是打日本鬼子的,你长大了也要加入队伍,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!”此后数年,大伯父就随太爷爷往返于文登、牟平及芝罘等地,为中共地下组织、八路军游击队筹集运送药品。在太爷爷的感召下,家族中有4人参军入伍。

上世纪50年代,国家号召农业合作化,太爷爷协助我二爷爷担任了初级、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。政府要组建兽医站,太爷爷关闭兽医铺及两个儿子的兽医门诊,让他们带上所有药品及器械,到兽医站参加了工作。

随太爷爷参加革命的大伯父叫王德茂,生于1927年,后来当上儿童团长,曾在威海、烟台等地跑“地下交通”。我爷爷被敌人盯上,抓到区公所吊在梁上严刑逼供,要他交出大伯父及枪支弹药。虽然爷爷是普通群众,却没有屈服,后经多方营救才保住一条命,但腿上留下终身伤残。大伯父参加了解放莱阳、青岛及上海等地的战斗,后留在青岛工作。他资历不浅但职务不高,却从无怨言。他负责青岛地区的物资供应,从未用手中权力谋任何私利。上世纪70年代,大伯父的女儿初中毕业,因哥哥参军入伍,政府为她安排了一份工作,但她坚决要求“上山下乡”。到莱州插队后,担任知青队长,在劳动中遭

遇意外塌方以身殉职,年仅17岁。大伯父强忍悲痛,就地处理完后事。老家有人找他批评价化肥,他说化肥是国家物资,不能私自调拨。2014年秋,父亲去看望他。他拉着父亲的手说:“在咱家我吃苦最多,道路最坎坷,但一想起牺牲的战友,就感觉能活到今天就非常满足了。有人说我胆小怕事,但我觉得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,要对得起组织和群众!”2015年7月18日,大伯父去世。老干部局的同志告诉大家,去世前几天,他刚让儿子交了最后一笔党费。他身后没留下什么,只有住了50年的60平方米的老房子及近万册图书。

与大伯父最知心的是我父亲,他上世纪60年代在莱阳卫校读书。下乡支农连续7天蹲着割麦子,右腿神经麻痹功能障碍险些残疾。1968年8月,父亲被分配到牟平养马岛医院。当时岛上治安形势紧张,为确保夜诊安全,武装部配发了两颗手榴弹。父亲一直藏在出诊包里,一背就是3年。被同事发现后,为让大家安心,他独自搬进仓库住宿。1968年12月担任卫生院院长,他带领一班人搞设计、跑征地、买石料、筹钢材,历经千辛万苦、饱受风霜雨雪,经军地双方共同努力,历时两年建成新医院。1970年腊月,他随队在冰封的海面上转运病人,掉进冰窟窿,死里逃生。1971年12月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1974年父亲任城关医院党委副书记、副院长,后调至牟平人民医院眼科。在孙娟主任的培养指导下,率先在胶东地区开展了青光眼手术——小梁切除术。上世纪70年代末,全省眼科学术会议在牟平召开,专家们称赞:“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,把眼科事业做得这么大,这种创业精神值得全省眼科工作者学习!”父亲从事眼科专业50多年,发表论文30多篇,先后被评为“山东省卫生系统职业道德先进工作者”“烟台市十佳服务明星”“烟台市优秀科技工作者”、区级拔尖人才及劳模,并担任《中华现代眼科学杂志》常务编委、烟台医学会眼科学会副主任委员。

如今,父亲已81岁高龄,但仍在眼科医院为广大患者服务。家族里的几代人,以实际行动赓续红色血脉、坚守理想信念,对党忠诚、爱岗敬业、无私奉献、奋斗终身。

“一卦信”

张永新

平日里,手机不离手,除了收发工作、生活信息,就是浏览新闻,追个短剧。有一天突然发现,曾经为之抓狂的书信往来已经离去若干年了。

最早有信的概念,是童年时看电影《鸡毛信》,儿童团长海娃的故事深深震撼着我。如果有一天,有封信到了我手里,我能不能也像海娃那样,拼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?后来上小学了,学习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《凡卡》,小凡卡的绝望、恳求和童真,让我对凡卡的悲惨命运充满了同情,更牵挂的是没有收信地址,没有张贴邮票,更没有信封,乡下爷爷到底能不能收到呢?

到了小学三年级,语文老师开始教我们学写书信了。从格式到语言表达、信封填写以及邮票张贴,都一一讲解,我们也开始在课堂练习写信。课间,语文老师喊住了正在院子里疯玩的我,让我写“一封信”三个字,我毫不犹豫写了,围着同学都笑了起来。天啊!我一直“封、卦”分不清,将“一封信”写成了“一卦信”。到了年终期末考试,老师押题,讲到“给某某一封信”时特意叮嘱,寄信人落款要按要求来,不能实名,还特意讲了个笑话,居然和大姐有关。当年,大姐上小学写作业“给妈妈的一封信”,写完就交上了。她同桌是邻家的男孩,习惯抄大姐的作业,这次不仅将书信的内容照搬,最后的署名还是“您的女儿秀珍”……

第一次真正写信是小学毕业前的那年腊月,有天,哥哥让我给刚调到外地工作的四叔写信,他口述我执笔。先写爷爷奶奶身体都好,再就是逐个介绍家人的情况,轮到我和二叔家弟弟时,哥哥让写上我们俩学习都好,年底都会评上三好学生等。那年,我虽然成绩不错,还当上了班长,但由于调皮被班主任老师批评了几次,自觉年底的三好学生够呛,就趁哥哥不注意,将信的内容作了删改。信寄出去了,终究觉得愧疚,过了很久还是向哥哥坦白了。后来哥哥随邻村工程队到外地打工,过几个月就给家里写信,给他回信的任务自然落到我的身上。说来可笑,回信内容就是流水账,罗列家里的事。其中,包括大姐和姐夫定亲后去走亲戚,还带去了个大西瓜;娘喂的老母鸡很久没下蛋了,有一天突然在柴垛后面的洞里捡到了十几个鸡蛋等等。写时无意,读者有心,后来哥哥回来说起这些,成了全家人很长一段时间的笑料。

1985年,二姐参加高考,考上了中专,成了村里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学生,更是全家的骄傲。每隔一段时间二姐总要往家里写信,开头顶格全称父亲大人,然后汇报在学校学习、生活情况和很多见闻,而且每封信里都夹一张最新的毛笔字习作,请父亲指正。二姐信中对校园生活的描述深深影响了已是初中生的我,对我端正学习态度,立志好好学习有很大激

励。我也常把自己的很多困惑写信告诉二姐,后来我高中毕业考上了警校,有生活补助,但条件还是艰苦。那时二姐已经成家并有了外甥女,很多时候回信由书法、文笔更好的二姐夫执笔。他们条件也不好,但每次都要在稿纸中间夹上一张五十或者一百元的纸币一块寄给我。有次,二姐夫在落款后面缀了一段:晚十一时,你二姐口述,我执笔,李一鸣(外甥女)呼呼睡大觉!读到这里,我忍俊不禁,又潸然泪下……

警校毕业不久,我和妻认识了。后来,我在单位宿舍给妻写过几次信,但没有用信封也谈不上贴邮票,都是叠成三角状,周末见面时当面交给她。结婚后,有次看她收拾自己的首饰盒,里面整齐摆着我写给她的三角信,不禁心头一热。

参加工作后,我和家人都在小城居住,经常见面,后来又安装了家庭电话,就不再写信。同学朋友之间,可以电话聊几句,之后又有了BP机、手机,再后来又通过QQ、微信聊,联系方式越来越多了,书信往来渐渐成了回忆。

在基层工作时,我曾经收到过很多信,多数是对身边战友工作肯定的感谢信,只有一次例外,是封求助信,一位外地老人请求帮助找失联多年的战友。线索很少,我却很重视,动用所有关系,借助所有手段帮助寻找,终于找到老人的战友是法院一位退休多年的老领导,不幸的是那位法院领导刚刚去世。虽有遗憾,但牵头帮两家联系上了,还是很高兴!现在,我在单位从事纪检工作,经常接到各种群众来信,每封信的内容、样式、文字表达水平参差不齐,但不管字迹是否潦草、内容表述是否准确、格式是否规范,我都认真阅读揣摩研究,围绕信的内容及开展工作,每封都耐心回复解答。

近几年,我曾经粗浅读过很多历史名人的书信,最多的是家书,如诸葛亮《诫子书》以及《曾国藩家书》《梁启超家书》,诸如“静以修身、俭以养德”“天下古今之庸人,皆以一‘惰’字致败”“成人优于举业”等内容,令我受益匪浅。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书信,如鲁迅先生的《两地书》,属“同志式恋爱书信”,林觉民剖白心迹的《与妻书》,读来更是字字泣血……

在今天这个微信秒回、视频通话随手可拨的时代,提笔写信似乎成了一种“过时的浪漫”,但有时候想,静下心来,梳理思绪,让情感慢下来,用有性格的字体、有情绪的笔墨,写点所思所悟,或者打油诗或者小短文,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,不用信封,省去邮票,忽略地址,更或者没有收信人,甚至直接压在箱底,若干年后重读,熟悉而又陌生的字迹、那天的空气、当时的喜怒哀乐,都会穿越时空扑面而来——当年留下的“时间胶囊”,一定会给未来送上一份惊喜吧!譬如,我的“一卦信”。